

目录

小引 1

灵魂的撞击 1

最是校园不平静 1

“阳谋”下的落网者 1

葑溪纪事 1

跃进岁月 1

张弛之间 1

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 1

诸神渴了 1

复旦园里炮声隆 1

按照剧本排演生活 1

大学还是要办的 1

艰难的转折 1

后记 1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小摇引



几年前，我出版了那本以描写复旦教师为主的《海上学人漫记》之后，就打算接着再写一本记叙复旦往事的散文集子，但因为其他事忙，一直因循未果。现在，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将临，我想乘此机会，将这本书写出来，一则为百年校庆凑个热闹，二则也算是给自己在复旦半个世纪的生活留个纪念。

复旦百年，大致可以 灵源 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灵源 年以前，复旦虽然有马相伯、严复、于右任、邵力子、李登辉、章益等名流学者掌校、任教，但在抗日战争以前，毕竟是一所规模较小的私立大学，抗战期间改为国立，也算不上名校。听老学长们说，抗战时期国内的四大名校是：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组成）、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抗战胜利以后，复旦在民主运动中较为活跃，但主要影响还是在上海地区，并不算是全国的先锋。灵源 年上海解放，复旦得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支持，才有了长足的发展。所以复旦将上海解放的日子：缘月 圆范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有它的道理的。

复旦之成为全国性重点大学，是在 灵缘圆 年院系调整之后。

灵缘圆 年的院系调整，是以前苏联的办学模式来改造欧美的办学模式。因为那时号召一边倒，举国上下正在全面学习苏联老大哥，高等院校自然不能例外。原来按欧美模式建立起来的大学，



1946年5月4日的复旦校门披着节日的盛装，用以庆祝新定的校庆日。



1946年代初期东移的复旦校门，面对着国权路。

一般是由文、法、理、工、商五大学院组成的多科性大学，有些大学还有医学院、农学院，院系调整之后，就改造成为两类大学：一类，是由文、理两个基础学科组成的综合性大学，如北大、复旦；另一类，是以某一两个应用性学科为特长的专科性大学，如清华以建筑和机械为主，交大以造船和电机为主。当然，院系调整也有很强的政治因素。教会学校被认为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有关，一律撤销，如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与国民党关系密切的学校也要撤销或削弱，如中央大学直接由国民党中央所掌握，自然不能继续

存在，所以早就改组为南京大学，广西大学的许多教授是桂系首领的智囊，这所大学与桂系军阀的关系太密切，也被撤销了，——现在的广西大学是后来重建的，而且校址也由桂林改在南宁。而复旦之所以能得到扶持，则与它在战后反对国民党政权斗争中的出色表现有关。

近年来，我们的高教界又在进行调整了，虽然并无“院系调整”的名称，其力度也相当的大。但调整的思路却与上次截然不同，甚至可说是反其道而行之，即以欧美模式来改造前苏联模式，又重新合并和改造为多科性大学，而且仿佛是以大为好，学校愈并愈大，有些还以全国最大的学校相标榜。行动虽然在变化，但对 50年的院系调整，却一直不见有什么认真的总结。这场改革到底给中国的高教事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前事倘无清晰的认识，那么，后事进行的根据又何在呢？



到得 50年代末期，复旦校门再次东移。这个校门造得很有气派，是师生们拍照留念常选的背景。这张照片是中文系 57级部分毕业生回校时所摄。

1952年的院系调整，对于有些大学造成了致命性的伤害，但复旦却是这场调整的受益者。它归并了许多学校的师资和设备，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院系调整的前奏，其实在1950年10月就开始了，从那时起，就陆续有一些高等院校并入复旦，如暨南大学、英士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等。刘大杰先生在暨南大学当过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他是1950年9月，在暨南大学撤销之后调入复旦的，所以才会在复旦经历1951—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且有轰动一时的跳黄浦事件；郭绍虞先生也是1950年9月从同济大学调来的，他原是同济文法学院院长。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是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之后，在1952年八九月份进行的，因为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又是按上面的指令办事，所以三下五除二就解决了，并没有费太多周折。

据《复旦大学志》记载，从1950—1952年，前后计有16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并入复旦。其中有公立大学10所：浙江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南京大学、英士大学、安徽大学、华东新闻学院；私立大学2所：大同大学、大厦大学；光华大学、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学院；教会学校4所：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金陵大学。加上复旦本校，这所新的复旦大学是由16所高等院校的有关系科组成，是全国院系调整中组合高校最多的一所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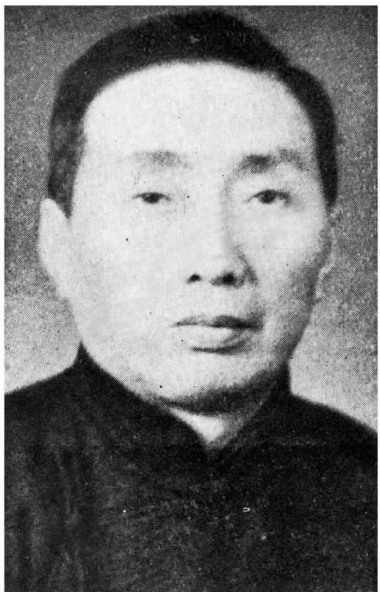
当然，复旦也有调出去的系科，如：财经学院的会计、统计、企业管理、银行、贸易、合作6个系，以及统计、贸易、银行3个专修科，就调出去组成上海财经学院；农学院的农艺、园艺、农化3个系，调至沈阳，新建沈阳农学院，茶叶专修科调至安徽大学农学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院 ;法学院法律、政治两系调出,与圣约翰等 怨所大学的有关系科合并,组成华东政法学院 ;外文系的德文组调到南京大学 ;理学院的土木工程系并入同济 ;文学院的教育系并入华东师大。此外,还撤销了一个系 :社会学系。

但总的说来,复旦是进多出少,力量壮大了。





复旦大学于 员怨缘怨年 苑月 圆怨日成立校务委员会,主任张志让 (左) ,副主任陈望道 (右) 。员怨缘怨年 员园月 猿日,陈望道担任校长。

办学的决定因素是师资力量。复旦在院系调整之后,汇集了一批著名学者,人才济济,极一时之盛。员怨缘园年代的学部委员和一、二级教授,就有一大部分是从别的学校调来的,如 :苏步青、陈建功、谈家桢、吴征铠、卢鹤绂、谭其骧等来自浙江大学,周同庆来自交通大学,顾翼东来自大同大学,吴浩青来自沪江大学,郭绍虞、杨武之来自同济大学,赵丹若、王恒守来自原中央大学,刘大杰、吴文祺来自暨南大学……当然,也有些在院系调整之前原就

在复旦任教的，如陈望道、卢于道、陈子展、周谷城、周予同、全增嘏、陈传璋、张孟闻、孙大雨等。

我在 [illegible]年入学时，院系调整已经结束，复旦的校舍虽然还很窳陋，但名师荟萃，实力强大。后来盛传当年复旦中文系有十大教授，其实，当时的教授何止十人。影响较大的就有：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陈子展、蒋天枢、王欣夫、赵景深、徐澄宇、吴文祺、张世禄、郑权中、李笠、乐嗣炳、贾植芳、方令孺、余上沅等人；陈望道原是新闻系教授，当时因为做校长事忙，也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创立的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与中文系有关，也可排在中文系教授名单之内。当时这些“老教授”大都还只有 [illegible]岁上下，用现在的标准衡量起来，大概只能算是中年教师，而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濮之珍、王运熙等中年教师，都还只有 [illegible]岁上下，照现在的说法，则是青年教师。他们当时大都精力充沛，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可惜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使人不得安闲，而且对人伤害很深。

除了思想改造运动之外，[illegible]世纪下半叶的政治运动我都身历其境，可以说是与复旦共同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往事虽然不堪回首，但是又不能不去回首。因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凡有老同学回校，每每要我陪着重游故地，看看当年上课的教室，抢过位置的图书馆和住过的宿舍。被打成右派，历尽坎坷的叶鹏同学，还要去凭吊当年批斗他的场所，以及他和当时的恋人依依惜别的地方。是的，无论是欢乐还是痛苦，这里都存留着我们岁月的印痕，它印在我们脑子里的，是抹不去的记忆。

我将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记录下一些 [illegible]世纪下半叶的复旦往事。为朋友，为后来者，也为我自己。

灵魂的撞击

建国以后，第一次针对知识分子的大规模政治运动，是1955—1956年的思想改造运动，而这种思想改造的要求，还是知识分子头面人物自己提出来的。这一点，不但后来者难以想像，就是过来人也大都记忆模糊了。但从文献记载上看，事实的确如此。

1955年10月，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首先提出在北大教师中进行思想改造学习的计划，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肯定。

同月16日，应马寅初校长之邀，周恩来总理到北大作《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为了扩大影响，便于在全国范围开展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主动提出报告会扩大范围，请京津地区各高校师生代表参加。

10月23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三次会议上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

10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当然，马寅初的思想改造计划之所以能迅速得到最高领导的肯定，而且立刻全面加以推广，只是因为这个计划正好投合了领

导上的需要，或者本来就是上面授意提出的。从毛泽东在建国前夕所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看，他把许多知识分子定位于“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本来就对他们持批评态度，当然是非加以改造不可的。可以说，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但从马寅初的行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知识分子自身要求改造的积极性。他们竭力想要捐弃旧我，争做新人，跟上时代的步伐，符合革命的节拍。当然，这也是形势逼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非接受改造不可。所以在马寅初提出思想改造学习计划之前，朱光潜就在 员怨缘怨年 员员月 圆苑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自我检讨》，接着，费孝通和冯友兰又在 员怨缘怨年 员–圆月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这一年》、《一年学习的总结》等文章，谈自己一年来思想改造的体会。

但谁又能知道，后来却是愈改造离共产党的要求愈远，愈改造愈变成为革命的对立面了呢？就连倡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马寅初本人，也在数年之后，因在人口论问题上坚持自己的学术见解，不肯屈服于强力的批判，而被拉下台来，成为拒不接受改造的顽固派典型。

这里只好说声“呜呼哀哉”了！

变革中的新奇与困惑

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只不过在员怨缘员年下半年之前，因为忙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还来不及全面展开罢了。

开始是采取正面教育的方式，学习社会发展史，学习辩证唯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物论，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和五评《白皮书》的文章，等等。于是，大家都认识到，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都是由五个阶段组成的，即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科学共产主义社会，这就坚定了大家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路的决心，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自由主义或民主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思想，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所以非加以改造不可。



[illegible]年代初期，多次在学生中发动参军参干运动，参干者，即参加军干校之谓也。当时的青年向往革命，报名非常踊跃。

同时，也动员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建国初期的社会运动实在太多，而且无一不波及学校。三大运动也相继化为：参军、参干、检举反革命、批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以及抗美援朝捐献运动……发动知识分子参加社会运动，一方面可以造成巨大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在参加社会变革中变革自己的思想。所以，连反银元贩子的斗争，也要学校派出宣传队，上街宣传。

而影响最大的，当然要算发动文、法两个学院的师生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了。

复旦土改工作队去的是淮北地区的两个县：五河与灵壁，参

加了两期土改工作。时间是从 员怨缘员年 员员月 苑日到 员怨缘圆年 圆月 远日,历时四个月。

当时,大学教授还有相当的威望,所以许多事情还得由教授出面或由教授挂名。比如,在学习动员阶段,学校组织工作队师生在胜利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白毛女》(那时复旦还没有放映机,所以只好组织大家到电影院去看电影),就由教务长周谷城教授在放映前作了半小时的动员报告,而工作队队长则由副教务长周予同教授担任,宣传部长是陈守实教授,因为他是研究土地关系史和农民战争史的,但陈守实不参加任何会议,宣传部的实际工作由副部长余子道代理,——余子道当时还是学生中的团员干部,已能独当一面了。

当然,教授们本来就是挂名的,复旦土改工作队实际上也是由副队长余开祥负责,余开祥是土改工作队党小组负责人。但余开祥也决定不了大事,因为他是知识分子党员,一则不了解农村情况,没有土改经验;二则本身也是要接受改造的。真正的决定权掌握在华东土改工作团手里,由他们来划定成分、选取斗争对象、决定处置办法等等。这个团由干部组成,已在苏北搞过几期土改,算是老手了。

尽管如此,教师们的积极性还是很高的,办事也十分认真。比如,有一户农民被划为地主,他们根据实际材料,认为是错划,就联名写信向土改工作团提出意见,力求做到公正。而对于干部中的不法行为,也勇于提出来,要求处理。所以在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农民们舍不得有些队员走,热情地加以挽留。

至于教师们此行的内心活动,我们可以从谭其骧教授日后在思想改造大会上的自我检查中看出。他在检查中说及自己积极报名参加土改的动机,除了“无可奈何”、“奉命参加”、“过关思

想”之外，还说了几条很可注意的想法：“光荣感，认为这样一场重大的政治运动，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工作队员，是非常光荣的”；“立功思想，自己没有什么光荣的历史，企图参加土改为党、为新社会做一点事，多少立一点功”；“面子问题，觉得这样重大的政治运动，如果不能参加就会被人瞧不起”；“镀金思想，参加过土改就有了政治资本”。（据葛剑雄《谭其骧前传》所录）这里所说的一些想法，是真实的，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过去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是把到欧美留学看作是镀金，现在却把参加土改看作是镀金，可见时代风气的变化，不是当事人自己说出，后来的人是难以想像的。



灵魂的撞击 灵魂的撞击年，复旦师生奉命组织土改工作队，开赴安徽，参加土地改革运动。这既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改造工作，也是一项重要的思想改造措施。图为参加土改的教师合影。

据老先生们回忆，当时参加土改的教师很多，历史系有：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中文系有：陈子展、刘大杰、蒋天枢、赵宋庆、胡文淑、鲍正鹄、胡裕树、蒋孔阳、王运熙；新闻系有：赵敏恒、曹亨闻、舒宗桥、杜月村；经济系有：朱伯康、苏绍智、陈其人。此外，还有外文系的全增嘏、社会系的孙桂梧、法律系的陈文彬，等等。他们中有些人还参加了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当然，这也只是挂名的角色，用来象征一种反封建的统一战线。

但由于华东土改工作团的干部们以老革命自居，对知识分子缺乏尊重，双方的矛盾也时有发生。最严重的一次是由工作团一名干部自杀事件引起的。这位干部追求复旦新闻系一位女生，纠缠不休，该女生被缠得没有办法，只好向小组长汇报，小组长葛迟胤严肃地批评了这位干部，叫他别再纠缠了。不料这个干部恼怒之下，竟开枪自杀了，——为了对付土匪和镇压土豪，土改工作团是带有枪弹的。于是工作团要追究葛迟胤的责任，强迫他作出检讨。葛迟胤是根硬骨头，他说自己没有错，坚决不作检讨。工作团就上纲上线，说他逼死工农干部，——这在当时是很严重的罪名。葛迟胤经过调查，指出该干部是小商人出身，而且搬出了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作为依据，证明小商人属于小资产阶级，与工人农民不是一个档次。毛泽东著作在当时是革命运动的指南，谁也不敢有所非议，此事只好不了了之。复旦方面对葛迟胤的行为是默许的，自然不作什么处理，在他毕业时还将他留校任教，可见对这个人还是比较欣赏的。但到得[illegible]年，葛迟胤却因宣扬系主任王中教授的新闻理论而获罪，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想，这与他骨头太硬，大概不无关系，因为领导上毕竟是不喜欢具有独立见解的人。[illegible]年代初，我与葛迟胤做过邻居，那个时候，只见他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完全没有一点硬气了，要不是

听到老学长的介绍，绝对看不出他当年的锋芒来，——他已经被改造得很好了。

五河、灵壁本来就是两个穷县，前两年刚打过淮海战役，灵壁县的墙壁上还有密密麻麻的弹孔，上一年又遭了淮河水灾，饿死和被一同避水到树上的毒蛇咬死了不少人。据余子道说，他在五河和灵壁跑了很多人家，就没有看见过一张四只脚完整的桌子，也没有看见过一家有脸盆、毛巾的，最好的人家，也只是在灶头上埋一个瓦罐，烧饭时可以热一点水，里面放一块旧布，全家轮流用这块布擦脸。有些人家父子两人合用一条裤子；有些在堤坝边搭一个草棚住，大水一来就泡在水里；有些人家住的房子没有屋顶，下起雨来只好东躲西藏。就是地主人家，也是破破烂烂的。当地以胡萝卜和山芋为主食，并辅以高粱粉，——这些粗粮，现在经过精心打造，已成为酒席上的特色菜，但在当时，却是粗粝得难以下咽之物。建房的材料，不是用窑烧的砖瓦，而是用碎麦秆、碎稻草与泥土拌起来在模子里压成的大土砖。历史学家周予同、谭其骧说，这是西汉时代的造房水平。而耕作方法，则连西汉也不如了，因为西汉早已有了牛耕，而在五河与灵壁两县，竟连一条牛也看不到，农民只好用锄头来翻地。

复旦的师生，长期在大城市里生活，有些学生的家庭环境还很好，何曾见过这种艰苦生活，所以这番经历，对他们了解社会、认识社会很有好处，思想上也确有很大的触动。但在总结会上，却又提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农民的思想意识是比较落后的，知识分子应向农民学习些什么？

这一个问题，连复旦土改工作队里的党员干部也无法解决，因为他们自己毕竟也是知识分子。听说，党小组长余开祥就引用过毛泽东的话，说毛主席曾经肯定过学生运动的先锋作用，并说

过知识分子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但来自中央工作团的党校干部则说：毛主席虽然肯定过学生运动，但他还讲过许多知识分子要向工农学习的话，这是一个方向问题。这位干部还斩钉截铁地说：知识分子应该向工农投降。

“投降”之说，复旦师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感到很新奇，很震动，也很不理解。但那时认为中央下来的人，水平总是很高的，何况还是党校来的呢！于是就带着收获和疑惑，回校去了。

在碱水里浸泡

土改工作队回到学校，思想改造运动也就开始了。

这时，华东局文教委员会从华东革命大学抽调了王零、郑子文等一批干部到复旦来加强领导，他们与[illegible]年派来接管复旦的军代表李正文、[illegible]年从华东新闻学院合并过来的该院的领导人王中等，共同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复旦大学委员会，改变了原来以地下党知识分子党员为主的领导班子。李正文任第一届党委书记。并成立了“精简节约及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简称“学委会”），以陈望道为主任，李正文为副主任，王零为办公室主任，具体领导思想改造运动。

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同时进行的，还有“三反”、“五反”运动。“三反”是针对干部的，“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本来应与知识分子无关，但因为所反者，都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所以也就搭上了界。因而，思想改造的第一阶段，重点也就在反贪污、反资产阶级思想上。

学校本来就是清水衙门，教师又不管理财务，哪里来的贪污事件呢？但华东军政委员会的干部却特地批判了“学校是清水衙

门,无贪污可反”的“错误观点”,于是教师们也只好挖空心思来检查。检查得最多的,大抵是用了公家的信纸、信封——甚至是旧信封、用公家的话机打私人电话、借了图书馆的书不还、丢掉图书馆的书不赔,等等。即使从不动用公家信纸信封的人,也要借此题目,检查一下思想,如周谷城在自我检查时就说:“我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是为了怕公私不分的批评,不贪便宜不是为公家打算,而是为自己打算,并不是真正爱护公共财物。”——这显然是为了要做检查而硬找话题了。还有人检查在某校多领了一个月的工资,而没有去上课;或者拿了多少稿费而没有交工会费;还有在解放前通货膨胀时期买过黄金、银元、美钞的。周予同检查自己用屋前敌伪留下的木头,做了一张小桌、四只椅子;胡厚宣则交代在解放前曾买卖甲骨,从中赚了钱,——这已算是较为明显的事,老复旦们至今还记得起来。我们今天看来,这些大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当时的学委会却把这一切都统计在贪污范围之内,李正文在总结报告中说:复旦教授中贪污的比例有[illegible],讲师有[illegible],真是可怕的数字。而当时复旦打出来的大老虎(即大贪污犯),是保健科李科长,他曾经在全校大会上坦白交代,说自己私卖掉多少阿司匹林和盘尼西林等,造成了轰动性的效果。但运动结束之后,他还是坐在保健科长的位置上。大概查实下来,情况并不如他所交代的那么严重吧。

此外,则是检查资产阶级思想。这是人人都有很多东西可以交代的。比如,周谷城就检查自己讲究衣着,追求享受,喜欢跳舞,“口袋里当票一大把,却经常上馆子吃饭”;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盛气凌人,绕着弯子骂人,“外表谦虚,实际傲慢不可一世”;“不做专家,以通人自居”,“好大喜功,不想老老实实做学者”,“对教学不负责任,胆大妄为,有一知半解就对学生讲”,等等。

(据《谭其骧前传》中所载谭其骧的会场记录)其他人也如此这般地发掘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洗手洗澡,涤荡污垢。

这种检查,还要深入到业务领域。比如:经济系教授陈观烈是美国留学生,学过凯恩斯理论,教的课程是国际金融和国际货币,于是就指责他贩卖帝国主义理论,为美帝张目,他只得自我批判,并因为认识得好,还在登辉堂全校大会上现身说法;政治系教授胡其安是英国留学生,研究西方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这当然也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货色,他也在登辉堂上做检查,批判资本主义政治理论与文官制度。

但并不是自我检查一下就可过关的,还要经过群众评议。而群众总是说你避重就轻,或者是思想根源挖得不深,还得重新检查。周谷城在经过群众评议后,就作过补充检查。当然,对各人的分寸掌握得并不一样,松紧的程度,其实并不取决于群众,而是取决于群众背后的领导。有一位当年参加帮助教师思想改造的学长告诉我,他们系的领导曾与学生积极分子约定,教师的检查是否可以通过,以举鸡毛掸子为号。这位领导坐在主席台上,台上放着一把鸡毛掸子,如果他举起鸡毛掸子,某教师的检查就可通过,如他不举鸡毛掸子,学生就应穷追猛打。这种戏剧性的举动,当然并非每系都有,但借助学生的力量来逼迫教师交代问题,则是统一的部署。

就在这种追逼之下,发生了刘大杰跳黄浦自杀事件。

大杰先生是具有浪漫性格的风流才子,早年又搞过小说创作,平时讲话虚虚实实,难免有些夸张成分。思想改造运动刚开始时,他由于缺乏这方面的经验,不知道运动的厉害,还是照往常一样,一坐下来就与学生随便乱吹。他研究过西洋文学,还写过评论表现主义的专著,对德法的情况当然比较熟悉,就与学生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